

高等教育信息

2026 年第 7 期（高教信息总 64 期）

发展规划处（质量评估处、高教研究所）编

2026 年 7 月 31 日

● 教育资讯

教育部召开年中推进会，部署推进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

教育部召开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工作座谈会

教育部：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教育部召开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

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部门决算

怀进鹏：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推动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

人社部：“十五五”期间将招募18.2万名“三支一扶”青年人才服务基层

我国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万！

● 高教聚焦

严纯华：锚定分类发展主线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 教育观察

全国教师少了22万，高校教师为何反增34万？

未来5年，大学有这些变化！

【教育资讯】

教育部召开年中推进会，部署推进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

7月15日，教育部召开年中推进会，围绕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两周年，统筹调度、系统盘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及部党组年度工作要点推进完成情况，对标对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推进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直属机关司局单位就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下一步考虑作了汇报交流。部党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进行点评和工作部署。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怀进鹏指出，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教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一是提高站位、融入大局，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中谋划教育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和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转变为方向、任务、项目，推动教育强国从高位谋划、统筹部署全面转向真抓实干。二是立足开局、系统布局，以全新谋划构筑四梁八柱，强化系统设计与整体谋划，抓住“改革”破题关键，以试点带动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编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是任务牵引、协同攻坚，锚定重大任务开展系统性攻坚，集成优质资源、典型应用和创新力量，推动教育综合改革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跃升，形成可推广的方案和有效工作机制，加快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治理转型，整体效能不断提升。

怀进鹏强调，当前正处于三年行动计划攻坚实施与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系统铺展的交汇叠加期。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and 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清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为教育强国建设多立新功。要以“五项重大任务”为攻坚靶心，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适应人口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全新要求，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动高等教育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加快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短板、摸清发力点，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制度保障。要善用攻坚方法，在守正创新中抓好落实，把握政策方向，突破思维极限，树好评价导向，坚持底线思维，确保重大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

机关各司局、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6年7月17日）

教育部召开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工作座谈会

7月13日，教育部在京召开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主力军、人才培养主阵地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水平。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主持座谈会。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高校基础研究新挑战新机遇新使命，主动识变应变，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建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高校从学科发展导向走向国家使命导向，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切实担负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

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构建“支点+平台+网络”的基础研究体系。建强高校支点，形成基础研究底蕴深厚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支撑力量；打造枢纽平台，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系统布局基础研究要素聚集平台；深化校际协同、校地联动、校企合作、国际交流，建立开放共享、国际协同网络。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把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作为基础研究体系突围破局的“总牵引”，联通支点、平台和网络。

会议强调，要聚焦五项重点任务，加快实现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一是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持续加大对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打牢交叉学科基础。二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布局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加快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布局高等研究院，推动基础研究孵化培育新质生产力。三是夯实人才培养主阵地。注重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长周期稳定支持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支持高校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四是强化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基础研究，加强算力、数据、工具等创新要素供给，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科研创新效率，构建高校人工智能开源众创机制。五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

以及国际开放联盟，构建国际协同网络，充分发挥港澳国际枢纽作用，拓展高水平国际合作。

会议要求，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高效组织、活力迸发的创新环境。要实施长周期稳定支持，推进评价制度改革，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为基础研究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要强化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教育，完善长效机制，涵养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优良学术生态。

会上，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教青局负责人，有关高校校长和专家代表，有关企业负责人作交流发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的举措和考虑。教育部有关司局和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高校代表，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会议。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6年7月15日）

教育部：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总结起来是“一免、两扩、三提高”。

“一免”指的是，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

“两扩”指的是，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

“三提高”指的是，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

资助资金投入稳步增长

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六成，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三

分之一。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受助学生规模持续扩大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学前教育阶段，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资助管理水平有效提升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在保护学生个人信息的前提下，与民政部、农业农村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残联等部门数据定期比对，每一所学校，登录学生资助系统就能看到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孩子的名单，谁最需要帮助，一目了然。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

（来源：教育部官网 2026年7月29日）

教育部召开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

7月14日，教育部在浙江大学召开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各地各高校深化高校体育改革、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实践探索，推动高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高校大力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深化高校体育改革，推动体育教学体系更加完善，治理格局不断健全，条件保障更加坚实，校园赛事蓬勃开展，高校体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加强高校体育工作是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要紧紧抓住大学生体质提升这一目标任务，坚持“一校一策”，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优化体育课程体系，丰富有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供给，保障锻炼时长。要完善体质健

康测试制度，构建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激发学生自觉锻炼的内生动力。要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改善体育场地设施条件，落实好经费投入保障，加强区域资源整合，推动高校体育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体育文化浸润，打造校园体育品牌，加强高校体育对外交流合作，守好学校体育安全底线。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新疆大学8所高校和北京市、浙江省教育行政部门作交流发言。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体育总局有关司局单位，相关高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来源：教育部官网 2026年7月14日）

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部门决算

7月25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部门决算。决算文件显示，教育部2025年度收、支总计均为70,441,585.53万元。与2024年度相比，各增加5,442,321.32万元，增长8.4%。主要原因是事业收入和财政拨款收入等有所增加，相应支出增加。

教育部2025年度本年收入合计47,602,537.97万元，比2024年度的42,828,112.97万元，增加4,774,425万元，增长11.1%。其中：财政拨款19,757,418.66万元，占41.5%；事业收入19,847,119.79万元，占41.7%；经营收入16,702.22万元，其他收入7,981,297.3万元，两项合计占16.8%。

教育部2025年度本年支出合计46,987,843.15万元，比2024年度的43,665,710.31万元，增加3,322,132.84万元，增长7.6%。其中：基本支出27,129,296.11万元，占57.7%；项目支出19,843,427.46万元，占42.2%；经营支出15,119.59万元。

（来源：教育部官网 2026年7月24日）

怀进鹏：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推动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

7月27日至28日，教育部举办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专题研讨班。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作“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步伐”主题报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嘉毅主持报告。

怀进鹏指出，高校书记、校长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善于从政治上看清问题、分析问题，始终把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作为根本前提、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强国建设

作为根本使命、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深刻认识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发展赋予高等教育更高的使命，深刻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带来高校科研范式的重塑，深刻认识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中高校面临的系统性挑战，推进办学理念、模式、体系的转型升级，推动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

怀进鹏强调，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敢于攻坚克难，抓住“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以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进一步促进高校提升科技自主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强化创新驱动策源地作用，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要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强化管党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执行能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专项整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强化闭环管理，提高治理效能，不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

本次研讨班是教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工作安排，旨在着力提升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为推进高等教育“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31所中管高校、49所教育部直属非中管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研讨班。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6年7月30日）

人社部：“十五五”期间将招募18.2万名“三支一扶”青年人才服务基层

7月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孙晓丽会上介绍，“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实施，20年来已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招募18.2万名“三支一扶”青年人才到基层服务。

人社部：“十五五”期间将招募18.2万名“三支一扶”青年人才服务基层

孙晓丽介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部署要求，近期，中组部、人社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与以往相比，主要有四个特点，可以归纳为“四个围绕”和“四个进一步”。

一是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优化布局结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三支一扶”计划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招募规模上，中央财政新增招募名额2000名，每年达到3.64万名，五年将累计招募18.2万名。在重点领域上，主动适应农村基础教育阶段人口变化，优化支教人员数量，重点充实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基层力量。在领域拓展上，积极开发基层发展急需的乡村规划建设、智慧农业、科技推广、文旅康养等急需岗位，引导“三支一扶”人员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二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进一步强化对重点区域的支持。“三支一扶”人员有朝气、懂技术、善创新，通过特殊政策引导鼓励他们到重点地区服务，可以更好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在支持举措上，主要体现为计划单列、重点倾斜和对口援助。计划单列就是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全额保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倾斜就是向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革命老区等艰苦边远地区倾斜，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对口援助就是健全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援助机制，完善“引、育、留、用”政策措施，吸引更多毕业生到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发展。

三是围绕青年成长成才，进一步强化能力提升。“三支一扶”人员从高校来到基层，要想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工作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还需要提高相应的能力素质。这就需要在选拔招募方面突出精准性，完善招募协作机制，科学设置条件，严格选拔程序，提高人岗适配率。在能力培训方面突出实效性，实施能力提升专项计划，加强分类培训、基层实践培训和专业能力知识更新，提升他们服务基层的实际能力。在实践锻炼方面突出系统性，更好发挥行业部门和用人单位的作用，多方搭建培养使用平台，健全导师帮带制度，选派参与基层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等，促进他们在基层实践中历练成长。

四是围绕扎根基层成长，进一步创新政策措施。通过第四轮计划实施，超过八成服务期满“三支一扶”人员都选择了继续留在基层。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宽基层成长空间。

（来源：中国网 2026年7月22日）

我国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万！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 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

制图：教育在线 数据来源：教育部官网 2011-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7月7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20万，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万。

2011-2025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从稳步增长到跨越式扩招，再到结构性重塑的深刻变革。15年间，硕士生招生规模从49.46万跃升至123.68万，增幅达150%；在学规模从137.46万增至354.60万，增长158%；毕业生规模从37.97万增至105.36万，增长177%。

纵观2011-2025年数据，其变化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两个关键节点：

2011-2016年，平稳增长期。硕士招生人数从49.46万缓慢增长至58.98万，年均扩招约1.5-2万人，增幅3%-5%。在学人数与毕业生人数也保持同步平稳增长。

2017年，数据出现关键变化。招生人数从前一年的58.98万激增至72.22万，单年暴增13.24万，增幅达22.4%。这一“跳涨”的主要原因是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统筹管理的改革。自2017年起，非全日制研究生被纳入全国统考，其数据首次被完整计入官方统计，导致招生人数和在学规模出现统计口径上的大幅扩容。

2017-2019年，招生规模从72.22万增至81.13万，年均增速约6%，扩招节奏持续加快。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从81.13万骤增至99.05万，暴增17.92万，增幅达22.1%。本次大幅扩招是国家层面立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应对疫情冲击、缓解短期就业压力的现实考量。与此相应，硕士生毕业人数则从2022年的77.98万跃升至2023年的92.76万，增

幅达19%。

2020年9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出台《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稳步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此后五年，硕士研究生持续稳步扩招，年度招生增量收窄至4—6万人，年度增幅约为3%-5%，重心转向质量提升与结构调整。专硕占比持续提升，在校生人数平稳增加，毕业生逐年走高。

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生持续扩招的同时，近两年，考研报名人数却出现连续下滑。面对延长的学制、上涨的学费以及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盲目追求学历的“性价比”正在被重新评估，“考研热”正逐步回归理性。

（来源：教育在线 2026年7月9日）

【高教聚焦】

严纯华：锚定分类发展主线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被置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关键枢纽地位。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史看，普及化并不只是入学规模扩大，更意味着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结构、质量标准、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层重组。关于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经典划分表明，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系统治理的重点将从机会扩展转向结构分化与质量协调。有学者指出，高参与度高等教育体系往往同时伴随包容性扩大和内部层化加深，因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缓解新的不平等和结构错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突破60%，全面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但越是在规模优势不断巩固的背景下，越需要清醒看到学科交叉受阻、地方高校定位失焦、人才供给结构性错配、评价体系过度量化等结构性矛盾已经不再是局部性、技术性问题，而是关系教育强国建设全局的制度性命题，正在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瓶颈。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十五五”时期是推动高等教育由大变强的关键转折窗口。本研究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全球高等教育变革趋势和高校区域互动融合进行考察，从现实瓶颈、国际镜鉴、核心突破和行动路线四个方面，讨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支点。

一、现实审视：阻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结构性瓶颈

从高等教育发展看，普及化并不意味着系统性矛盾的自然消解，而是会把精英化、大众化阶段累积的资源配置、组织分化和质量保障问题进一步前置。“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规模突破，全国新增本科专业布点8600个、硕士学位授予点4500余个，建成全球体量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人才供给总量持续扩容，每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1200万。规模优势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使内涵发展的结构性短板更加突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大学上”，而是能否形成与国家战略、科技前沿、产业变革和人民期待相匹配的高质量供给体系。

其一，交叉学科建设深陷“六难”困局，学科边界固化为制约创新的组织壁垒。学科既是知识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是大学内部权力、资源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组织载体。关于“学术部落与学科领地”的研究说明，学科共同体具有稳定的价值规范、边界意识和资源秩序。这意味着，交叉学科改革需要突破长期由院系、学位、职称、经费和评价共同塑造的制度边界。我国交叉学科布局起步较早，但客观来说，其制度设计尚未充分转化为实践效能，跨学科研究普遍遭遇开展研究难、协同合作难、经费资助难、成果认定难、创新文化培育难、学术身份认可难等现实障

碍。从知识生产模式看，知识生产强调在应用情境中生成，具有跨学科、异质性组织和社会问责等特征，而学科壁垒问题的实质，则是传统以单学科共同体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现实复杂问题之间的张力。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封闭、高筑的学科壁垒和研究范式已难以回应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复杂前沿问题对系统集成、跨域协同和场景验证的要求。若不能有效重组学科组织，学科就会从知识分类工具异化为制约创新的制度障碍。

其二，地方应用型高校陷入资源分散与定位漂移双重困境，办学功能难以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地方应用型高校长期追求学科布局“大而全”、资源配置“均衡化”，有限资源被“撒胡椒面”式分散，缺乏优势特色学科的集中培育，难以形成特色学科群和核心竞争力。更深层矛盾在于评价标准错位：不少地方高校仍沿用研究型大学的单一评价标尺，形成“重论文、轻应用”，“重学术声望、轻区域贡献”的导向，出现实验室数据亮眼而产业关键技术供给不足的“学术高地与产业洼地”割裂。相关研究表明，当资源获取、组织声望和评价标准高度绑定时，后发高校往往会模仿高声望组织形态，从而削弱自身类型特色。对地方应用型高校而言，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向研究型大学看齐，地方应用型高校只有在区域产业结构、创新生态和公共需求中找到稳定位置，才能将学科优势转化为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和区域治理能力。因此，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困境并不是能力不足的单线叙事，而是资源约束、评价错位和定位漂移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三，学科发展逻辑尚未完成从“学科自身逻辑”向“国家使命逻辑”的根本转向，学术供给与公共需求之间仍存在张力。长期以来，高校学科设置多以学科内部细分、知识体系完整和学术共同体认可为主要依据，即便工学、农学、医学等强应用属性学科，也较多围绕“我能做什么”展开，而未能充分转向“国家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与高校能够贡献什么相结合”的使命逻辑。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来自国家、市场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当大学越来越深度嵌入国家创新系统和社会问题解决过程时，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标准需要与外部公共价值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然而，“五唯”评价惯性尚未彻底根除，唯论文标尺在不同学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文科研究的现实解释力和思想创造力被窄化，理科研究偏离基础科学的原初问题意识，工科研究弱化工程问题导向，医科研究容易忽视临床价值和健康服务贡献。学科专业作为人为建构的治理工具，本应随科学演进、学生发展和社会需求动态调整，却在实践中固化为影响改革的组织边界。

其四，人才供给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存在结构性错配，规模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能力优势。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总量持续增长，人才供给规模不断扩大，但供给结构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前沿演进和产业岗位变化之间仍不匹配：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绿色低碳等领域人才供给不足，高层次复合型交叉人才储备短缺，毕业生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和岗位胜任力与市场真实要求之间存在落差。其根源在于，学科专业调整机制仍偏静态，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师资结构、课程体系、实践平台和质量反馈之间尚未形成贯通闭环。国家有关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政策已经明确要求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专业布局，但真正的制度难点在于建立“需求预警-政策协同-资源配置-质量反馈”相贯通的闭环与连续机制，使高校能够在国家战略急需、产业迭代速度和教育培养周期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若缺乏这样的闭环机制，人才培养就容易在专业目录上“追新”，但在课程与培养体系上“滞后”。

综合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供给不足”转向“供给结构与国家战略、科技前沿、产业发展不匹配”。如果说普及化阶段的前半程主要解决机会扩展问题，那么普及化中后期的改革重点则在于通过分类发展、学科重组、质量保障和评价改革，实现系统结构的再平衡。“十五五”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在规模优势基础上推动质量跃升，以结构优化、评价改革和治理重塑支撑高等教育由大变强。

二、借镜观形：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三重走向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范式，把高等教育推入“结构性再组织”。全球高等教育变革并不是简单地向某一国家模式收敛，也不是若干国家案例的并列陈述，而是大学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产业创新和公共责任之间重新定位的过程。已有研究表明，现阶段高等教育正在同时受到大众化、国际化、知识经济、质量保障和公共责任等多重力量的影响。与传统改革不同，当前变革的核心不是单个学科或单项政策的调整，而是大学与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交织与重组。已有研究已充分证明，大学在知识生产、产业创新和社会协同中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在此背景下，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相继围绕人工智能、质量保障、学科结构、人才培养和财政激励推进改革。以下提炼其背后共同呈现的三条改革路径：一是以人工智能和复杂问题为牵引的知识生产与学科组织重构路径；二是以学习成果、资格互认和质量文化为核心的信任治理路径；三是以国家使命、产业政策和财政杠杆为支撑的结构性资源配置路径。

（一）路径一：AI驱动下的学科敏捷迭代与治理风险并存

美国高等教育在新技术驱动下表现出较强的学科敏捷调整能力。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人工智能与决策”主修专业，两年内跃升为全校第二热门专业；全美多所大学快速增设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等专项学位，传统计算机专业生源被更细分、更贴近前沿应用的培养项目分流。从理论上讲，这种快速迭代能力与美

国高校较高的院系自主权、课程市场反馈机制、产业资本连接和跨学科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关于融合研究的报告指出，面对复杂科学和技术问题，高校需要通过组织结构、教育训练、资助机制和评价方式的同步创新，促进不同学科的深度整合。

但美国经验也警示我们，学科敏捷调整不能脱离稳定的公共治理基础。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面临政治化干预、联邦项目削减、生源萎缩和成本攀升等多重压力，部分高校在财政约束下不得不压缩学术投入。这说明，市场和技术能够推动学科快速更新，但若缺乏稳定的公共投入、清晰的大学使命和有效的质量治理，也可能加剧高校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而言，应学习其快速响应技术变革的机制优势，同时避免政策短期化、财政不确定性和市场逻辑过度扩张对大学使命的侵蚀。

(二) 路径二：质量保障由外部合规审查转向内生能力建设

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把质量保障从外部合规检查推进到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建设。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与指南(ESG)强调，质量保障首先是高校自身的责任，外部质量保障应服务于内部质量改进，而不是替代高校的主体责任。这一理念与博洛尼亚进程以来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高度相关，其目标并非单纯追求跨国可比性，而是通过学习成果、资格框架、学生参与和外部评审等机制，形成可持续的质量改进生态。2024年欧盟推出“欧洲学位”蓝图和相关质量保障、学历承认建议，进一步试图把跨校联合培养、跨境课程、自动承认和质量保证联结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高等教育学历资格承认公约》则把公平、透明、非歧视和可靠信息作为资格承认的基本原则，标志着质量保障已经从区域内部制度安排扩展为全球高等教育流动的信任规则。这意味着，欧洲及国际范围内的质量保障改革，正在从“是否符合外部标准”的程序逻辑，转向“高校是否具有持续改进能力”的能力逻辑。对我国而言，外部评估的价值不应停留在材料审核和指标排名，而应通过同行评议、社会参与和数据反馈，促进高校形成自我诊断、自我改进、自我更新的质量文化。

(三) 路径三：以财政杠杆推动学科结构性重组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呈现出政府产业政策、财政资源配置和高校学科调整强协同的特征。文部科学省通过专项基金支持高校面向增长领域调整院系结构，东京大学规划新设人工智能、太空、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相关院系，并采用英语授课培养国际化科创人才；全国范围内通过招生名额调整推动理工科扩招，目标是提高自然科学领域学位比例；部分文科院校压缩传统招生名额，增设建筑设计、农业信息、脱碳技术等交叉应用学院；本科-硕士五年一贯制则旨在缩短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周期。日本实践说明，政府并非只能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学科调整，更可通过财政杠杆

和政策激励，引导高校把办学自主性转化为服务国家产业战略的行动能力。但任务化重组同样存在风险：如果国家战略被简单理解为短期产业热点，容易造成高校追逐政策项目、压缩基础学科、削弱学术自主；如果财政激励与评价周期过短，也可能诱发新的同质化和形式主义。有研究表明，大学自治与竞争性资源配置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单纯行政控制并不能自动提高大学绩效。因此，国家战略牵引必须与大学自主、长周期评价和基础研究保护相结合。

概括而言，全球高等教育的三重走向代表了三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路径：其一，面向人工智能和复杂问题的知识生产重构，要求高校具备跨学科组织和敏捷专业调整能力；其二，面向跨境流动和社会问责的质量治理重构，要求高校从外部合规走向内部质量文化和信任基础设施建设；其三，面向国家战略和未来产业的资源配置重构，要求政府以财政、招生、平台和评价等工具形成任务导向的政策组合。三条路径共同说明，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层逻辑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系统适配”，从“单项政策优化”转向“治理体系重塑”，从“高校内部自治”转向“国家使命、科技前沿、区域发展和学生成长之间的动态平衡”。由此观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既要坚持国家统筹，也要把分类评价、资源配置和高校自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有方向、有弹性、有反馈的现代治理体系。

三、核心突破：以分类发展与差异化评价破解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衡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化解当前高等教育多重矛盾的关键牵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均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列为重点任务。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社会人才需求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特征，改革必须从过去强调“分层发展”的逻辑，转向重视功能分工和使命差异的“分类发展”逻辑，并配套建立差异化管理和评价体系，实现“不同赛道、不同标尺、不同支持方式”。

（一）明晰三类高校差异化使命定位，扭转“千校一面”同质化格局

分类发展的前提，是把不同类型高校放在国家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区域发展格局中重新定位。明晰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类高校使命定位，首先要从“分层发展”的惯性转向“类型生态”的思维。

研究型高校应以原始知识创新、战略科学家培养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核心使命，围绕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地。对这类高校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短周期成果数量，而是能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方向、组织大团队、建设大平台，并在长期知识积累中形成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用型高校应面向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纵深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聚焦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服务，实施“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优秀”的“双优”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用型高校的优势在于把真实产业问题转化为教学内容、科研选题和技术方案，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和区域创新生态培育中形成切实贡献。技能型高校则应突出技术技能培养和岗位能力塑造，面向实体经济一线输送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新型工业化、数字化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不只需要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需要能够理解复杂设备、掌握工艺流程、适应智能制造场景并持续更新能力的高技能劳动者。把技能型高校简单置于高等教育链条末端，是对技术技能形成规律的误读。它们应当在职业能力标准、工作过程知识、产教融合平台、现代学徒制和终身学习体系中形成特色，而不是被迫以论文、课题和“升格”作为主要成功标志。三类高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使命、功能和评价逻辑之别。只有使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才能改变“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竞争，形成研究型高校引领创新、应用型高校支撑产业、技能型高校夯实一线能力的协同生态。

分类发展还需要在国家战略与区域实践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双向赋能。高校与区域的关系正在从“物理共存”走向“化学融合”，高水平大学不仅是城市名片和文化窗口，也是区域创新生态的核心结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航天科技与计算机领域、西北工业大学在军用飞行器制造领域的长期贡献，体现了研究型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独特价值；浙江大学通过遍布全省的技术研究院网络嵌入地方产业集群，大连理工大学依托工科优势融入辽宁产业升级转型，则展示了应用型服务和区域协同中的大学功能。对地方高校而言，分类发展不是降低要求，而是在真实需求、优势学科和区域资源之间找到高质量发展的生长点。因此，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深层目标，是把过去围绕单一声望体系展开的竞赛，改造为各类高校各司其职、协同共生的良性生态。

(二)以贡献治理重构评价标尺，破解“指标治理”的反身性陷阱

评价制度不是中性的测量工具，而是资源分配、组织行为和学术文化的强信号。Espeland和Sauder关于排名反身性的研究指出，公共测量并不只是描述现实，还会反过来重塑被测量对象的行为与目标。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问题，本质上不是指标技术问题，而是单一绩效逻辑对大学复杂使命的压缩。过度量化评价至少存在三重深层危害。第一，它以标准化指标压缩高校差异化发展空间，使高校把“更像研究型大学”误认为“更高质量”，从而催生“大而全”“同质化”和“为指标办学”的组织冲动。第二，它以碎片化成果替代立德树人的整体目标，把人才培养、价值塑造、实践能力、长期成长等难以即时量化的任务边缘化，形成“重科研、轻教学”“重项目、轻育人”的

扭曲激励。第三，它使量化成果、人才头衔、平台项目和资源倾斜相互强化，形成闭环式马太效应，既加剧校际分化，也削弱跨学科协同和服务区域的动力。对应用型高校而言，若继续照搬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标准，就会把其最应强化的工程实践、产业服务、技术转化和区域贡献置于评价边缘，最终导致“夹心层”困境制度化。

因此，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彻底破除“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过度量化评价弊病，确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具体而言，一要全面破除“五唯”桎梏，摒弃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片面考核逻辑；二要实施分领域评价准则，基础研究重点考察原创性、学术价值与科学贡献，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则以产业转化成效、用户反馈和市场实际检验为重要标尺；要强化用人单位和社会主体的评价参与，将毕业生岗位胜任度、长期发展质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纳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四要统筹职称、编制、薪酬、科研平台、招生计划等配套政策，打通评价改革制度链条；五要涵养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完善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和学术共同体治理。同时，还必须搭建政府、行业、高校、社会“四元主体”协同评价机制，将关键行业难题攻关、技术转化收益、实践育人成效、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服务区域贡献作为应用型高校核心考核指标，真正以“新尺子”评价“新赛道”。

评价改革既要“破”，更要“立”。破“五唯”只是纠偏的起点，真正决定改革成效的是能否建立兼具科学性、公平性与引领性的评价新标尺。科研和人才培养均具有长周期属性，“短平快”的评价方式容易诱发功利化和短视化，应强化过程性、周期性和阶段性评价，推广以“小同行评议”为核心的专业评价机制，赋予学术共同体更大职业自主权，使评价回到专业标准、学术规范和真实贡献本身。对于教学型、科研型、社会服务型人才，也应在同一价值体系中予以同等尊重，让各类人才在各自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

四、行动路线：以结构重塑、机制再造和数智赋能推进“十五五”高等教育改革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不仅要承担基础研究主力军、人才培养主阵地、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基本使命，还要承担国际合作主界面、文化弘扬主干道、文明指引航标灯等时代职能。立足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优质均衡高等教育供给三大核心任务，未来改革应在结构变革、模式变革和体系变革中协同推进。

（一）搭建“顶天立地”的学科专业敏捷动态调整机制

“顶天”，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立快速响应通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空

天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学科专业，形成必要的战略储备。“立地”，是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特色优势专业，避免盲目追逐热门赛道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制度设计上，应构建“需求预警-研判决策-专业撤并转立-质量反馈”相衔接的敏捷响应链条，依托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行业发展监测和区域产业图谱，定期识别紧缺领域、冗余专业和潜在增长点。在保障教育规律和培养周期的前提下，赋予高校更充分的专业调整自主权，同时建立撤销、合并、改造、新设的分类通道，使学科布局能够跟上科技和产业变革节奏。学科调整不仅是制度和结构层面的优化，也涉及教师发展、学术归属和组织文化。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对既有学科和岗位的压缩，而应通过转岗培训、资源倾斜、平台建设、团队重组和新课开设，引导教师向新兴、交叉和战略急需领域有序流动。麻省理工学院以共享教职方式推动计算科学与传统学科深度融合的经验表明，跨学科建设的关键不在于机械增设机构，而在于盘活现有师资、重组知识结构、形成持续创新的组织机制。

(二) 构建内生驱动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保障改革的关键，是推动高校从“被动应付外部评估”转向“主动开展持续改进”。高校应成为质量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学生发展、实践教学和毕业去向，建立覆盖全过程的数据采集、诊断反馈和改进行动机制。外部评估机构的职能也应相应转型，从单纯评估组织者转向质量能力建设者，为高校提供数据分析、同行咨询、改进建议和质量文化培育支持。借鉴欧洲社会外部评审经验，可常态化引入企业、行业协会、用人单位、校友和社会组织参与专业认证与办学成效评审，使评价更加贴近真实岗位需求和社会贡献。与此同时，应加强质量保障数字化转型，建设智能化质量监测平台，使质量数据与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形成联动。

(三) 以分类评价牵引高校特色化分类发展

分类发展能否落地，关键在评价结果能否真正影响资源配置和办学选择。对研究型高校，应重点考察基础研究原创突破、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引领能力；对应用型高校，应重点考察产教融合深度、技术转化实效、解决行业企业真实问题的能力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对技能型高校，应重点考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就业适配度、岗位成长性和产业一线服务能力。评价方法上，可借鉴“莱顿宣言”、DORA和CoARA等负责任科研评价理念，坚持量化指标服务而非替代同行判断，承认研究产出、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开放合作的多维贡献。评价结果应与经费投入、招生计划、学科专业布局、科研平台、人才项目等资源配置形成联动，打破“帽子-资源”的固化绑定，完善“管办评研选用”协同机制。评价体系也应从单纯后验型考核转向发展型激励，鼓励该写论文的把论

文写在高水平学术问题上，该解决国家需求的把成果落在真实问题和真实贡献上。

(四)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不是三个系统的简单并列与叠加，而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对规划、政策、资源和评价进行系统重组。面向复杂科学问题和真实世界挑战，高校应把培养复合型、交叉型、创造型人才作为核心任务。科教融汇要把科研训练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使学生在真实问题、真实平台、真实团队中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产教融合要依托产业提供问题场景、实践载体、技术路线和经费支撑，使教育链与产业链形成深度互动；学科交叉要突破院系壁垒，建设跨学院、跨学校、跨区域的交叉创新平台，形成稳定的组织支撑；评价联动则要统一以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配置育人和科研资源。只有实现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和评价联动，才能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在科研组织方式上，应处理好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的关系。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跨学科团队协同攻关，是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但原始创新也常常孕育于长期积累、自由探索和非共识问题之中，二者应形成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动态平衡。高校既要在“卡脖子”技术和重大工程问题上强化体系化攻关，也要为一部分学者进行“天马行空”的基础探索留出制度空间。唯有坚持二者并重，才能在解决现实急需的同时厚植“开天辟地”式突破的创新土壤。

(五) 依托数字化与AI技术重塑高等教育办学新形态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知识生产、学习认知和组织治理方式，高校人才培养也必须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向能力生成、问题解决和智能协同并重。未来，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将逐渐成为类似数学、哲学一样的基础性通识能力，高校应加快推进项目式学习、微专业、跨学科模块化课程和弹性培养路径，使学生能够围绕复杂问题组合知识、工具和方法。数字化转型还应服务教育公平和优质资源共享，推动“在地国际化”与“虚拟国际化”双轮驱动，使更多学生获得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学习体验。在治理层面，高校要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管理精细化、学习支持个性化和质量监测实时化能力。对“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在经费稳定、人才集聚和贡献评价上给予制度支持，使其在新兴学科和前沿交叉领域形成可持续创新能力。教学改革同样需要“有组织”的系统推进。与科研活动中高度依赖学者个人探索的自发属性不同，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实践平台和质量反馈更需要顶层设计和组织协同。高校应建设跨院系课程开发团队，推动教师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形成“一门新课程，三年成雏形，五年再变革，十年成经典”的持续迭代机制。数智技术可以进一步打破校园物理边界，推动优质课程资源、虚拟仿真实验和学习分析工具共享，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数据驱

动、智慧融通的新型教育范式。

(六)支持顶尖一流高校实现从“顶天立地”向“开天辟地”战略跃升

对多数高校而言，“顶天立地”意味着在既有学术体系和产业赛道中追求高质量发展：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又扎根区域经济社会需求。但对于少数冲击世界一流前列的顶尖高校，仅做既定框架内的最优者并不足以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代际跨越。这类高校必须主动承担“开天辟地”的使命：在“天”的维度上，开辟原始学术范式，提出新的思想、假设、理论和实验体系，形成能够被国际学术共同体跟随的新知识疆域；在“地”的维度上，开创引领性产业疆域，催生并主导重大新应用场景、新技术路线和新产业生态，从技术需求的回应者转变为需求的定义者和产业的架构者。与之匹配，人才培养目标也要从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进一步升维为培养具有国际领导力的人才，使其能够设定科学议题、定义技术轨道、引领创新生态。

五、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变强的关键历史窗口期。当前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供给领域的多重矛盾，本质上是规模扩张阶段遗留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对标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交叉化、多元化变革浪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停留于局部修补，而应牢牢抓住分类发展与分类评价这一关键牵引，贯通学科动态调整、内生质量保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数字化转型全链条，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从指标驱动转向使命驱动、从单一尺度转向多元贡献、从外部约束转向内生改进。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格局调整，破除固化评价积弊、重塑学科发展体系绝非一蹴而就。结合高校办学治校实践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逻辑，是彻底扭转“学科自洽”的传统办学思维，牢固树立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前沿演进、区域产业发展和学生全面成长的使命导向。唯有持续完善差异化、多元化、贡献导向的现代评价体系，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找准定位、特色发展，持续夯实高水平科技自主创新与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根基，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久久为功，才能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

【严纯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7期）

全国教师少了22万，高校教师为何反增34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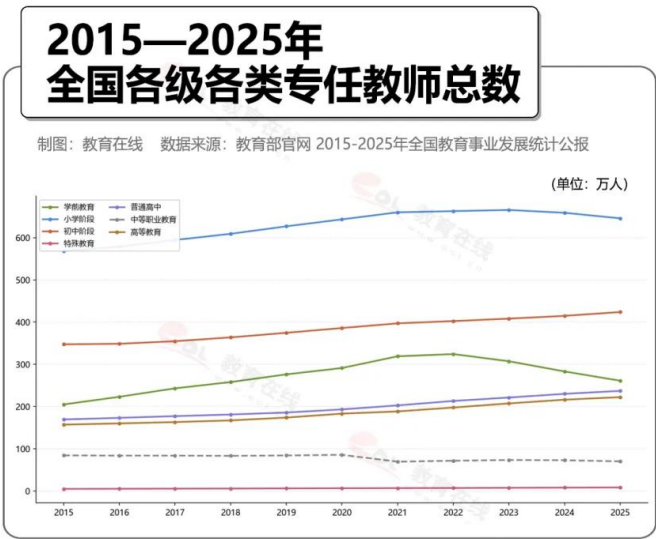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透露出一个很有反差的信号：全国专任教师总数已经连续两年下降，高校教师却还在增长。



2023年，全国专任教师总数达到1891.78万人；2024年降至1885.10万人；2025年进一步降至1870.10万人。两年时间，全国专任教师总数减少了21.68万人。

但高等教育专任教师却是另一条曲线：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为188.52万人；2022年增至197.78万人；2023年为207.49万人；2024年为216.35万人；2025年达到222.36万人。五年间，高校教师增加了33.84万人。

也就是说，当学前教育、小学等学段的教师数量开始收缩时，高校教师仍然处在增长通道里。



这组数据背后，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高校教师岗位，还会继续增加吗？这扇窗口，究竟还能开多久？

五年增加近34万，高校教师还在扩容

2021年至2025年，全国高校教师数量五年增加33.84万人，增幅接近18%。这不是一年两年的偶然波动，而是连续增长。2021年到2022年，高校教师增加9.26万人；2022年到2023年，增加9.71万人；2023年到2024年，增加8.86万人；2024年到2025年，增加6.01万人。增长还在继续，但增速已经开始放缓。

这说明，高校教师队伍仍处于扩容阶段，但它不是无限加速。过去几年，高校还在补教师、扩队伍；接下来，高校教师岗位仍有增量空间，但不会再是简单铺开放式扩张。换句话说，机会还在，但会越来越挑学校、挑学科、挑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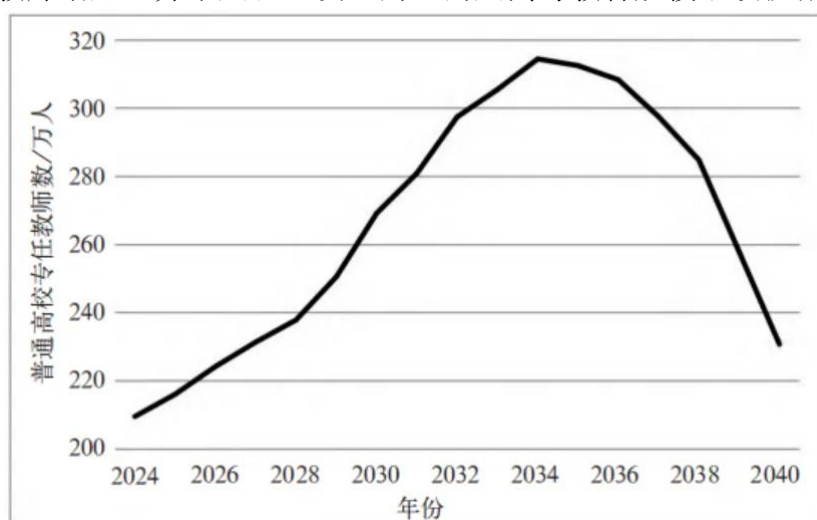
4873万人在读，高校还需要老师

再看学生规模。2021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430万人；2022年为4655万人；2023年为4763.19万人；2024年为4846万人；2025年达到4872.57万人。五年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增加442.57万人。

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也在继续增长。2025年，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3953.96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2135.77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51.83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1766.36万人。

研究生规模同样增长明显。2021年，全国在学研究生333.24万人；2025年达到429.95万人。五年增加96.71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从50.95万人增加到75.36万人，增加24.41万人。

学生多了，研究生多了，导师、课程、实验、论文指导、实践教学都需要人来承担。高校教师增加，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张的结果。



真正的窗口，可能还有不到十年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发展趋势预测(2024-2040年)(数据来源：任增元等)

高校教师数量上升期窗口不会一直开着。根据学术界基于人口变动的预测，我国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在2034年前后达到峰值，峰值规模超过8700万人。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4年前后，高校仍会面对一轮适龄人口上行周期。全国人大相关调研报告也提示，人口变化将深刻影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高校教师队伍调整不宜盲目扩张，也不宜简单大幅减员。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高校教师岗位仍有增长空间。特别是理工农医、人工智能、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职业本科、应用型高校等方向，对教师的需求仍会比较明显。但未来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高校学生规模也会进入新的调整期。到那个时候，高校教师需求不再是简单增加，而会转向结构调整。

不是每所高校都能分到这波红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高校教师虽然还在增长，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所高校、每一个专业都好进。从数据看，高校数量在增加，教师数量在增加，但增长方向已经有明显结构性。职业本科增长很快，普通本科继续扩容，高职院校规模仍然庞大，而成人高校数量则在减少。

从政策和数据走向看，未来还有岗位增量的，大致会是三类方向：一是国家战略急需学科，比如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制造等；二是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特别是能对接区域产业的专业；三是承担研究生培养和高水平科研任务的高校和学科。相反，一些办学定位不清、专业吸引力不强、生源基础薄弱的高校，未来可能面临更大压力。高校教师岗位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不会平均分配。

对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来说，真正要看的不是“高校还招不招人”，而是“哪些高校还需要人，哪些专业还有增长，自己能不能匹配这些新需求”。

大学扩招，最终要看有没有好老师

高校教师数量增长，从来不只是教师自己的事。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大学质量最终要落到课堂和导师身上。高校扩招之后，如果教师跟不上，学生很快就会感受到：大班课更多，导师指导不足，实践训练不够，毕业论文没人细看，创新项目缺少真正带领。

如果教师队伍同步增长、质量同步提升，扩招才可能真正变成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否则，扩招只是规模变大，学生未必真的得到更好的教育。

所以，未来高校竞争，不只是看校区大不大、楼多不多、招生名额多不多，更要看能不能把好老师引进来、留下来、用起来。一所大学的水平，最后还是会写在老师和学生每天相遇的课堂里。

（来源：EOL教育在线 2026年7月10日）

未来5年，大学有这些变化！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未来5年，大学将有哪些变化，一文看——

“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增加10万人以上

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

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重点支持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

完善顶尖学科孵化支持机制，高质量建设数理化生和文科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基地。

深化“双一流”建设机制和评价改革，探索与建设目标相匹配的差异化支持、评价方式。

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支持高校改善办学条件

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

支持高校改善办学条件。

推动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共建区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区域发展智库、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技术转移转化平台。

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健全东中西部高校对口支援机制。

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支持部省合建高校加快发展，优化部省共建高校区域布局。

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

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加强高校科研能力建设

探索建设科技商学院

加强高校科研能力建设，组织高校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实施高水平品牌系列期刊建设工程，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探索建设科技商学院，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建强高校科技成果交易平台。

鼓励高校推广“项目制”育人培养方式

探索“博士+硕士”双学位等人才培养模式

发展高质量本科教育，强化学生核心知识、核心能力培养，深入实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鼓励高校推广“项目制”育人培养方式。

打造卓越研究生教育，健全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选拔、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机制，探索“博士+硕士”双学位等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来源：新华社 2026年7月3日）